

# 戰前日本的女性歷史學家 ——論山川菊榮在史學史上的缺席



長 志珠繪 著

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研究科

湯雅婷 中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45 期 2025.12

## 研究問題

本次工作坊聚焦於 19 至 20 世紀的女性歷史學家，是一項深具意義的比較研究計畫。在此主題下，近代日本有哪些女性史家值得討論？若以 1950 年代以前的日本為範圍，要找到受過大學制度化訓練，且活躍於日本史學會的女性史家並非易事。在戰前日本，女性是被高等教育摒除在外的，尤其是大學的專業訓練。戰前的歷史學界不允許女性參與培養歷史學者的完整體制，歷史學也因此普遍被視為一門「男性化的學科」。

另一方面，從戰前以來已有民間研究者在從事有關「女性史」的研究，高群逸枝（1894-1964）便是其中的代表。但是，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為何高群在日本二戰總體戰期間以歷史學者身分展開寫作時，她會被視為女性史家？為何高群的著作總是出現在史學史的討論之中？同時期，山川菊榮（1890-1980）陸續出版了《武家的女性》（武家の女性）和《我所居住的村莊》（わが住む村）（均於 1943 年出版），不論作為研究專書或是歷史敘述，兩本著作皆具備創新和方法論的價值。儘管如此，山川菊榮卻未被視為歷史學家，而是以 20 世紀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及理論家身分著稱。那麼，「女性歷史學家」究竟有誰？為何山川的著作未能被史學史視為戰時歷史敘述的一部分？

本文將從「研究戰前日本歷史且受過專業訓練的女性是誰？」的視角出發，進而討論以下三個議題：

1. 重新審視歷史學家在戰前日本被視為「男性化專業」的觀點，以證明當時確實有女性史家取得「國史」學士學位；
2. 聚焦山川菊榮文本寫作期間「女性史」的出現；
3. 基於 1 和 2 的討論，重新探究山川兩部作品作為歷史敘述的特徵。

透過這些討論，本文擬揭示戰後史學史敘述中所忽略的面向，並為理解戰前日本的女性史家提供嶄新的論點。

# 一、高等教育制度與女性

## （一）戰前日本的高教體制與女性學習

戰前日本的高等教育機構作為進入學術界的門檻，是專為男性學習者設計的。尤其是十九世紀成立於東京、京都的兩所帝國大學，以及包含殖民地的教育機構。雖然當中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人才輩出，但即便到了二十世紀，這些機構並未在培育女性研究者上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教育與職業迎來時代的轉捩點，中等教育機構的畢業者急速增加；而 1918 年《大學令》頒布，促使 1920 至 30 年代許多私立男子高等教育機構升格為大學，擴大了學習的場域。但在高等教育機構的體系化和整合當中，女性卻被忽視了。女子大學的設立雖早有訴求，但始終未被認可，而女性的入學資格則由各校自行決定。名為女子大學的諸多女性高等教育機構，其受教資格實際上和男性大學不同。雖然有案例顯示部分學校（以理工科系為主）允許女性入學，<sup>①</sup>但每所大學的科系有限制，且女學生的身分並非正規生，僅是旁聽生。<sup>②</sup>

山川菊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已提出近代日本女性中等及高等教育的問題。在 1919 年的《婦女的勝利》（婦人の勝利）中，山川首先針對男女間教育制度的性別差異展開批判，指出兩性間課程的難易度存在差距，不僅「女性的知識水準停滯不前」，教育年限的不同也影響很大，女性教育幾乎止於高等學校；而女子專門學校不論是數量或種類均十分稀少，使有意接受專門教育的女性沒有太多選擇。山川強調這不只是量的問題：

若從女校和女學生的數量來看，日本的女性教育絕對稱不上發展不良，但卻也不值得讚揚。日本的當務之急，是要廢除男女學生之間的差別待遇，統一教科書和教育方針，賦予女性和男性同樣標準的學習自由。我雖然主張一般的男女共學制度，但現在首要之務，是至少先開放中學給希望受教的女性。<sup>③</sup>

山川於 1922 年進一步在“Women in Modern Japan”一文中批判日本教育制度和女性職業資格間的關聯。她曾以英文發表以下論點：<sup>④</sup>

① 這不代表男性也不會被排除在外，戰前日本的高等教育機構是由大學、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師範學校等諸多性質相異的學校所組成。即便是男性，大學入學資格也以預科的高等學校畢業者為原則，高等師範學校或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是不具備大學的入學資格的。

② 即使是正規入學，第一所正式承認女性就讀的大學——東北帝國大學理學部，也因為缺額的關係，而進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招募，類似的案例也為數不少。

③ 山川菊榮，《婦人の勝利》（東京：日本評論社，1919），頁 194-196。

④ Kikue Yamakawa, “Women in Modern Japan,” 《社會主義研究》4.6（1922.9）：1-5。

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日本的社會狀況經歷了劇烈的變遷。然而婦女教育的原則卻未與時俱進，仍然以培養過去幾世紀以來賢妻良母的被動美德為目標，而不是符合社會變化的專業知識及職業訓練。這般女性教育與其實際地位之間的矛盾，對於職業婦女的身分最為不利。

或如下指出性別差距在中等教育階段已經事態嚴重：

或者，我們可以說情況在中等教育階段已經相當嚴峻，並可由以下觀察得到印證：——兩性之間的差異在中等教育顯得更加明顯，在此階段男女都有五年制的課程，但兩者之間的差距是如此懸殊，以至於讀完五年課程的女生，其程度幾乎僅相當於念完三年課程的男生。

山川主要的論述架構認為，日本的中等及高等教育制度因為性別差異的設計，導致女性的職業訓練不足，進一步阻礙女性職涯的發展。

政府設立的唯二女性高等教育機構是兩所培育女子高中師資的高等師範學校。其他女子大學則是由私人資金創辦，大部分是透過外國傳教士的資助。這些機構偏好宗教研究或是各種符合淑女教育的技能，而非客觀的科學研究。整體來說，大學仍然未對女性開放，直到最近才有幾所學校允許女性修習僅限文學或社會科學的課程，但仍不開放作為正規生入學。因此，缺乏職能培訓以及性別資格的限制，遂使女性被排除在知識性專業之外。

以上引用的原稿刊載於 1920 至 23 年間，以社會主義立場發行的日文啓蒙雜誌《社會主義研究》。該文以“Women in Modern Japan”為題，分五回以英文連載。從山川的觀察可見，戰前日本的女性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也因此被系統性地剝奪進入學術界以及獲得學術訓練的機會。

## （二）山川菊榮如何求學？

### 1. 山川菊榮的教育經歷

山川菊榮舊姓青山，其外祖父是幕末水戶藩的歷史編輯，同時也是著名的漢學家。山川的母親千世以及兄姊都是直接由祖父教授漢學素讀（譯按：先不解字義而按字面上誦讀）。江戶至明治這段過渡期間，武家親族之間的家族關係十分複雜。她曾寫道：「我從小就看著身邊女性的悲劇長大——有的作為小妾被奴役、有的被迫婚嫁、有的因為丈夫的不檢點而深受折磨。」<sup>⑤</sup> 1873 年廢藩置縣後，因祖父為明治政府的官員，全家便在東京定居，山川菊榮因此於東京出生。父親因通曉法文而擔任陸軍省的翻譯，以此為契機，他支持明治初期政府的殖產興業政策，從事養豬業並成為肉品製

<sup>⑤</sup> 山川菊榮，《二十世紀をあゆむ——ある女の足あと》（東京：大和書房，1978），頁 74。



造業的先驅，事業所及之處甚至包括北海道及臺灣。青山家族一方面具備漢學與古典的文化素養，同時也接受報章雜誌等新型文化媒介，父親甚至把《平民新聞》引入家裡，這是一份與平民權利運動有關的報紙。兄姊也都接受高等教育而拓展自己的職場，山川菊榮便是成長於東京近郊，這般具有明治時代先進知識與文化的家庭環境之中。

在就讀完2年的麹町番町小學校高等科後，1902年4月，山川進入位於小石川的東京府立第二高等女學校。然而，山川和許多女孩對於未來的想像——「獨立」、「至少能具備養活自己的能力」，這樣的期望卻被當時的女校視為異類。山川認為女校「對於賢母身分的強調是如此單調且無趣」，<sup>⑥</sup>她寫道：「在學校時我不喜歡縫紉，因此常被批評，被說這樣嫁不了人，或是沒有辦法組織圓滿的家庭。婚姻和家庭總是被用做說教的工具，令我厭倦」。<sup>⑦</sup>她以自學獨立並獲得工作為志，在接觸自然主義文學後感到無法滿足，進而申請東京帝國大學的旁聽生。然而該制度並未將女性納入考量，最後，山川放棄了最初的目標，畢業一年半後，她申請進入女子英學塾（譯按：現在的津田塾大學，是日本最早的私立英語女子專門學校）就讀。但該校主要著重於英文，這使她感到十分乏味；儘管如此，教科書的內容卻和當代的新興思想有關。在女子英學塾學習英語幾年之後，對於近代史家犬丸義一詢問她如何以英文寫作的提問，山川做出以下回應：

若先以日文書寫，再把文字翻譯為英文的話反而比較困難。在津田，每週都有英文作文的課程，下一週時老師會評量我們的作業並提出新的課題。在那些題目當中，也包含了「婦女參政權」以及「婦女的地位」等議題。<sup>⑧</sup>

在明治後期至大正時期，男性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對於像山川這樣渴求新知的女性而言，充滿了強烈的無助感。正如她所言：「我不知道自己應該去哪裡追尋什麼，彷彿在黑闇中盲目摸索，內心充滿躁動與不安；那些應當被培養的能力，最終卻未能得到耕耘」。<sup>⑨</sup>

## 2. 山川菊榮與翻譯

眾所皆知，山川菊榮是20世紀極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及理論家。<sup>⑩</sup>研究山川菊榮的學者伊藤セツ指出，山川接受了專攻英語的最高等女性教育，具備「精湛的英語能

⑥ 山川菊榮，《二十世紀をあゆむ——ある女の足あと》，頁73。

⑦ 山川菊榮，《二十世紀をあゆむ——ある女の足あと》，頁54。

⑧ 菅谷直子、外崎光広、犬丸義一採訪，〈山川菊榮 日本における社会主義婦人論の形成過程〉，「歴史評論」編集部編，《近代日本女性史への証言》（東京：ドメス出版，1979），頁73。

⑨ 山川菊榮，《二十世紀をあゆむ——ある女の足あと》，頁55。

⑩ 戰前日本女性主義的核心爭論——「母性保護論爭」（1918-1919）打響了山川的名號。她深入探討女性生活困難的根源，指出問題主要源自明治民法所支持的家庭制度與家父長制，以及資本主義經濟所造成的結構。憑藉著對同時代以英語圈為主的女性理論與社會思想派系爭論的獨到分析，她從翻譯起步，逐漸在1920至30年代確立了社會主義思想家和女性問題理論家的身分，廣為人知。

力作為強大武器」。<sup>⑪</sup> 她以翻譯活動為志業，最早將探討德國革命的文本《大戰的審判》英譯本（譯按：原書名 *J'Accuse!*，作者為 Richard Grelling, 1853-1929）翻譯並引入日本，還出版了 3 冊專書，更於 1918 年，年僅 28 歲時在社會政策學會例會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勞動問題的報告。專攻同時代社會思想的伊藤，對於山川的著作水準亦予以高度評價。另一方面，當 1919 年共產國際成立後，山川率先在日本介紹其女性政策，並首次舉辦由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 1857-1933）倡議的國際婦女節活動。1920 年代的山川菊榮，可以說是日本當時唯一能夠全面掌握共產國際婦女政策的女性作家。<sup>⑫</sup>

時至今日，山川菊榮的思想仍不斷地以各種形式被討論，包含舉辦大型研討會。此外，神奈川縣立圖書館的山川菊榮文庫也著手進行檔案的重新整理。山口順子將山川尤其豐富的翻譯作品造冊，重新注意到她以翻譯起家、逐步形成思想的脈絡。山口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匯率變動，使得外文文獻更容易取得，促使山川的翻譯量於 1918 年左右起迅速增加，並於 1921 至 22 年間達到高峰。」<sup>⑬</sup> 1922 年她完成了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 1840-1913）的《婦女論》（*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全書翻譯，是為一大成就；同時，山川還集結了 40 篇以上歐美關於俄羅斯革命的文章與報導譯作，出版專書《黎明期的俄羅斯》（黎明期のロシア，1923），積極展開與翻譯相關的言論活動。誠如伊藤在《山川菊榮研究》內也注意到般：「和同時代的女性主義者相比，山川菊榮獨特的國際性正是源自於她透過翻譯所累積的知識產製。」<sup>⑭</sup> 事實上，山川充分掌握英語圈最新的女性問題論點，她通曉勞動問題相關的理論著作，並長期持續收集及關注這些議題的具體研究。戰後不久，山川便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勞動省婦人少年局局長，在負責擬定政策期間（1947-1951），這些知識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sup>⑮</sup>

另一方面，在出版《武家的女性》之前，山川已經參考英語圈的研究動向，試圖撰寫一部追溯至原始古代社會的比較女性史通史。《婦女的勝利》（初版 1919 年）正是此一嘗試的成果。該書透過與西洋史的比較，主張日本社會是由母系社會轉變成父系社會，並將婚姻制度（包含財產）的轉換點與武家社會的形成相連結。這部自國家史視野出發的女性史，對於「日本婦女問題研究」的討論範圍，從古代社會經中世紀武家社會，再延伸到資本主義社會；而如此宏大的主題在 1922 年被進一步拓展，山川以英文發表了一篇概論，探討從日本明治維新到 1920 年代「近代婦女」的女性問題。

⑪ 伊藤セツ，《山川菊榮研究——過去を読み、未來を拓く》（東京：ドメス出版，2018），頁 89。

⑫ 伊藤セツ，《山川菊榮研究——過去を読み、未來を拓く》，頁 209。

⑬ 山口順子，〈山川菊榮の翻訳文献原著一覽を公開して〉，《労働者運動資料室会報》60（2024）：1-5。

⑭ 伊藤セツ，《山川菊榮研究——過去を読み、未來を拓く》，頁 89。

⑮ 山川在戰後旋即被新成立的勞動省提拔為婦人少年局局長，於 1947-1951 年間擔任中央省廳的局長。這不單只是著名的女性勞動問題理論家被選為中央省廳的行政官僚，也意味著女性政策由勞動省所管轄，而非隸屬教育問題；同時，也實踐了山川自戰前以來所主張的論點——「婦人及少年」也應當被視為勞動力的成員，並被納入勞動問題內認真看待，因此深具意義。

犬丸義一在上述訪談中，對於山川的英文論述給予「以社會主義立場、觀點及方法書寫近代日本女性史的第一人」的高度評價。<sup>16</sup>作為理解社會主義思想最前沿的理論家，山川選擇以歷史敘述方式作為思考現代女性問題的手段。如何以批判性的視角將當代社會相對化？顯然，山川嘗試撰寫一部著重於變遷與結構的女性史通史。

那麼，歷史學作為一門學術學科，其所設想的學習者究竟應具備何種樣貌？

## 二、國史學是否是一門「被男性化」的學問？

### （一）高等教育與史學系／國史學系

近代歷史學的建立，是以所謂的公共世界為研究對象，尤其是本國史，就是透過探究國家的起源來闡明國民的形成。歷史學研究會所編的《學術與性別》（アカデミズムとジェンダー，2022）將歷史學視為一門旨在培養「男性化專業」的學問。<sup>17</sup>然而，史學史往往忽略了對「歷史學」敘述者的討論。日本戰後歷史學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史學史著作，是中世紀歷史學家永原慶二的《二十世紀日本的歷史學》（二〇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4）。該書是研究戰後歷史學的必讀文獻，內容也涉及諸多戰前議題，包含日本殖民地的歷史研究，或是性別研究的相關觀點。擔任《學術與性別》日本篇編輯的大江洋代，曾評價永原的著作為「沒有女性的史學史」，<sup>18</sup>許多讀者想必也都深有同感。同時，大江進一步指出，「女性歷史學家」和「女性史的敘事者」兩者應該予以區別，他解釋道：

我們鮮少見到將女性史家納入討論的史學史，但另一方面，若女性史家是專研女性史並涉及性別史，相關的史學史就有豐富的案例……至於未涉足女性史或性別史研究的女性史家，則往往不在史學史的關注焦點之內。<sup>19</sup>

這裡所指的「豐富的案例」大多出現在1945年以後，但從性別差異的角度來探討大江所謂「史學史的關注焦點」卻是十分重要。然而，「史學史如何將研究議題與敘事者結合起來？」與「歷史學界中是否真有女性立足之地？」實則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我認為首要應當討論的前提是：「史學系」在戰前高等教育體系內究竟佔有什麼樣的地位？

<sup>16</sup> 菅谷直子、外崎光広、犬丸義一採訪，〈山川菊榮 日本における社会主義婦人論の形成過程〉，頁38-39。

<sup>17</sup> 日本的大學制度從明治時期開始將歷史學講座導入課程制度當中，進而有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的區別。

<sup>18</sup> 歴史学研究会編，《アカデミズムとジェンダー：歴史学の現状と課題》（東京：績文堂出版，2022），〈女性が歴史学を研究すること——日本編〉，頁88-89。亦可參考同書收錄〈女性が歴史学を研究すること——西洋編〉一章。

<sup>19</sup> 歴史学研究会編，《アカデミズムとジェンダー》，〈女性が歴史学を研究すること——日本編〉，頁87-88。



一項不容忽視的重點是，近代日本大學設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高級官員，旨在培育更多通過高等文官試驗的人才。然而，在戰前高等教育機構中，若隸屬文學部的「史學系」並非以培養文官為目標，其成立目的又為何？戰前文學部下獨立設有史學系的學校，舉例來說有東京與京都兩所帝國大學，之後成立的帝大則是設立法文學部（譯按：法律與文學），史學系的獨立要到更晚才得以實現。<sup>20</sup>

另一方面，在戰前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官立高等師範學校作為培育師資的專門學校，其下設有「歷史地理學系」或「地理歷史學系」。但是，帝國大學的入學考試僅限男子高等學校畢業生報考，即使是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也不具應試資格。此時便產生一個問題：私立專門學校是否同樣設有「國史」科系？

有關太平洋戰爭晚期歷史教育機構的動向，大江在前述論文中注意到，東京女子大學或日本女子大學均設置了國史系；在男子教育方面，也有如東北帝國大學，在文學部獨立後開設國史學系的案例，這些現象反映出戰時對於國史學研究需求的增加。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國史學系在數量上的擴增？我們可以參考1943年11月發行的《專門學校一覽》（文部省專門教育局編）進行進一步的確認。

在這份報告書中共計載有112所私立專門學校，其中男校66所、女校42所、男女合校4所。但是，僅有6所設有與「歷史」相關的學系。其中，文科下設有國史類別的僅見於「明治大學專門部—文科—地理歷史系」，其餘五所學校（法政大學、日本大學、駒澤大學、立正大學、大正大學）則是在專門部下設立培育師資的「高等師範科」，並於其中設置歷史地理系或是地理歷史系。

如上所述，即使在戰前的男子高等教育機構中，設有歷史學系的私立專門學校也是少數。此外，就算部分師範學校或其學科涵蓋歷史學，由於這些學校的學生不具有官立大學的入學資格，其定位與旨在培養研究者的大學等教育機構有明顯差異，兩者的距離可謂相去甚遠。

那麼，針對山川批評1920年代女子高等教育機構中學科設置極為有限的情況，到了1940年代是否有改變呢？根據前述《專門學校一覽》的記載，私立舊制女子大學（女子專門學校）所開設的學科，扣除醫學、藥學專門學校以外，大多集中於家政科或文科，而文科中以國文系和英文系為大宗，法商科系則為少數。此外，在7所官立女子專門學校中，沒有一所設立史學相關的科系。

另一方面，戰前日本女性最高學府的官立東京與奈良兩所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其文科下均設有「歷史地理學系」。在《學術與性別》中曾指出，高等師範學校因以培育

<sup>20</sup> 後來成立的九州、東北二所帝國大學均設置法文學部，當中唯有東北帝國大學，在文學部獨立之後於1941年另設置史學（國史）講座。此外，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第一批取得學士學位的女性有兩名，分別是久保ツヤ和櫻田ツヤ（畢業自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她們於1923年入學，分別主攻心理學與哲學。另外1927年第一位進入帝國大學的韓國女性為辛義敬（畢業自梨花女子專門學校），她則選擇學修習西洋史。



師資為目標，並非「專業研究歷史的機構」，因此未被納入討論範疇。然而，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結論：在戰前的高等教育體制中，不論官立或私立，歷史學的專業教育主要是依賴師範機構的支持，史學系的設置本身則屬少數。特別是「國史」作為一門學問，雖然在國家主義的氛圍下被推向熱點，但在整體制度內卻無法真正與高等教育機構有效接軌。因此，將戰前的歷史學單純視為「男性化的專業」，這應當是不正確的理解。

此外，從「女性史家究竟有誰」的視角出發，我們勢必得確認更多問題，例如：什麼樣的高等教育機構能提供更多學習歷史的機會？這些機構中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因此，我們將重新聚焦於戰前的師範學校。根據學習國史的女性身分的不同，她們被描繪的形象也將有異。

## （二）戰前女性在國史學系中的學習

戰前日本的官立大學中，開放女性就讀的學校屈指可數，文科更是少之又少。其中，設有史學系並能培養國史專業的「文學士」者，僅有東京與廣島兩所官立文理科大學。這兩所大學以師資培育為目的，初期的入學者多為留職進修的教師，已經是社會人士。這個特點是源自一項劃時代創舉：將「高等師範學校畢業者」納入入學資格，且不單僅限於男性，也開放接受女性入學，因此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在實際上落實招收女性入學及培育女性畢業生的學校，就是東京與廣島的文理科學大學。

東京文理科學大學是最早培育多位「國史學系」女性畢業生的學校。在1929年4月的入學生中，第一批選擇「國史」為志願的新生總共有15人，其中包含2名女性，分別為赤木志津子（來自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與加藤トキワ（來自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此後，國史系的女性還有1939年畢業的大井ミノブ、須田春子（來自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以及1942年的勝守すみ（來自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廣島文理科學大學也有於1941年畢業的山本舛江（來自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這些都是可以確認的戰前女性就讀者。<sup>②①</sup>從整體來看，東京文理科學大學的女性入學人數有94人，廣島則有54人，<sup>②②</sup>但當中僅有少數修習國史，而且幾乎都是來自兩所官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畢業生。以上的數字，也反映出當時女子中等教育機構內史學系的匱乏。

大江的研究中對於戰前女性歷史學家的討論，是以是否在大學等學術機構接受歷史學專業教育作為衡量標準，因此他關注的不是高群逸枝，而是經濟史的三瓶孝子（1903-1978）。大江認為，三瓶是「自發尋求專業教育，並在男性霸佔的戰前歷史學

②① 戰後東京文理科學大學的女性就讀者只有1949年畢業的水江漣子（來自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②② 村田鈴子，《わが国女子高等教育成立過程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0），頁82-83。

界中，以經濟史佔有一席之地」。<sup>23</sup>三瓶是第一位獲准以旁聽生身分在早稻田大學經濟學部上課的女性，並於1928-1931年間修習經濟學。她的著作《日本綿業發達史》（1941）獲得了極高評價。大江引用三瓶戰後自述：「我當真是女學生中的先鋒」<sup>24</sup>一言，發人敬崇及省思。然而，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東京文理科大學對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者敞開大門，廣收正規生，並開始探索歷史學專業教育的可能性，進而促使更多女性得以受教並取得學位，這一點應當同樣值得關注。這個觀點也與另一個問題息息相關：設置於大學中的「國史」學科，其定位又該如何解讀？

無論如何，於戰前取得國史學士學位，並在戰後獲得大學教職的女性歷史學者，是戰前東京文理科大學的畢業生——赤木志津子（1900-1990）。赤木於戰後進入御茶水女子大學任教，著有多部關於平安時代文化史的研究著作。我們可以從她的回憶錄中，略窺戰前學習場域的樣貌。

我們（女性）五人進入文理科大學就讀，在近代女性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特別是女性學習歷史學是過去從未有過的事。「是因為校長三宅米吉博士說『女生也可以來讀』，所以妳們才能進來的。」……總之，這是一個男人的世界。<sup>25</sup>

（男學生）因為周遭有女生而覺得新鮮，甚至可說是充滿好奇心。……女生休息室似乎成了關注的核心。人們會趁四下無人時溜進去，留下惡作劇的訊息；或是翻閱女生忘在休息室內筆記本的，想看看女生究竟寫些什麼。我們憤怒地下定決心絕不能輸。這在各方面都讓人感到氣餒。<sup>26</sup>

然而，赤木在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所接受的教育，和男子高等師範學校的畢業者相比，是屬於初級的史學專門教育，因此，她與同期入學的男學生在學術基礎上有明顯的差距。

我每天從世田谷區的家裡通勤至大學，專心聽講，並一頭栽進《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交織成的歷史世界中，連自己都感到驚訝。我從早到晚勤奮向學，但是，男同學們卻早已這麼做許久了。對此，我總是體悟到自己的不足，並更加鞭策自己。<sup>27</sup>

<sup>23</sup> 三瓶孝子自東京女子大學高等部畢業後，於早稻田大學經濟學部以首位女性旁聽生的身分接受專門教育（1928-1931），並於同學部畢業，成為高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她1941年的著作《日本綿業發達史》獲得高度評價。其後於日本勞動科學研究所從事調查研究的工作。歷史學研究会編，《アカデミズムとジェンダー》，〈女性が歴史学を研究するということ——日本編〉，頁92。

<sup>24</sup> 三瓶孝子，《ある女の半生——嵐と怒濤の時代》（東京：三一書房，1958），轉引自歷史學研究会編，《アカデミズムとジェンダー》，〈女性が歴史学を研究するということ——日本編〉，頁93。

<sup>25</sup> 赤木志津子，〈史学研究の志〉，《教師の五十年——史学研究女性の回想》（東京：雄山閣，1985），頁148。

<sup>26</sup> 赤木志津子，〈史学研究の志〉，頁158。

<sup>27</sup> 赤木志津子，〈史学研究の志〉，頁148。

該做的事、該讀的書實在太多了。讓人忙碌得心情難以承受……即使同樣是畢業自高等師範學校，男生與女生所學的內容似乎有很大的差異。<sup>28</sup>

我們來看看赤木每天的學習歷程。她爲了把《日本書紀》作爲史料讀得透澈，不只把釋義本翻遍了，也爲了能夠閱讀德文原文書，進而在校外修習德文。

島田均一老師的《二十二史劄記》容易閱讀而且十分有趣。……我在此時才體悟到，以前小時候父親讓我讀《四書》和其他作品的漢文是何等重要。女學生比男生更擅長解讀漢文，與此同時，男生們對於三宅老師在重要的國史課上只著重於《古事記》的教學表達了不滿。……於是，課程內加入了狩谷棧齋（1775-1835）的作品，我們開始讀《古京遺文》。內容雖然很有意思，但是十分艱深。雖然還未到達專題討論會的形式，但大家都很努力。<sup>29</sup>

狩谷棧齋（1775-1835）是江戶時代後期的考證學者，其著作《古京遺文》爲研究古代金石文的重要專書。對於男學生們而言，將《古事記》作爲史料解讀的研究方法，早在高等師範學校時期就已學過。因此，教師可能是爲了提昇學生們解讀古代史文獻的能力，才將狩谷的作品納入教材。

另一方面，相較於男學生，女學生因更擅長漢文解讀，而得以在輪讀史料的專題討論場合上發揮所長。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戰前，也持續至戰後，在身爲少數派的女學生們的回憶錄內屢屢可見。當時極少有女性能夠進入高等教育機構內學習，尤其在高等女子學校，以選修方式學習漢文科目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不論是赤木志津子或是山川菊榮，她們的漢學素養皆來自於祖父或是父輩的教育。可見唯有受惠於家庭文化資本的女性，才能在當時具有與同輩男學生競爭的能力。

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在文理科大學所開授的國史學課程規模實際上不大。以1953年東京帝國大學的國史學系爲例，當年的學士畢業生有25名男性，另有1名韓國生，而整體國史學系的學生人數則有95名（其他歷史學科人數：西洋史系70人、東洋史系68人）。赤木於東京文理科大學在學期間，曾參加佛寺的資料考察與相關田野調查，並在指導教授的指導與建議下，完成畢業論文〈鎌倉時代的政治與精神考察〉，於1932年在同校畢業。另一方面，赤木的回憶錄內也記載了當時學生所關心的學術主題。1930年代的國史學系學生們特別關注「文化史學」的潮流，其中亦包含「女性史」的相關議題。

（學生們）尤其推崇有關精神方面的研究，當時是西田直二郎博士的「文化史、女性史」洛陽紙貴、平泉澄博士極爲活躍的時代，我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接受文化史學的洗禮，成爲一名文學學士。

<sup>28</sup> 赤木志津子，〈史学研究の志〉，頁154。

<sup>29</sup> 赤木志津子，〈史学研究の志〉，頁156。

那麼，為何對當時的學生來說，文化史潮流有如此的影響力，而非戰後成為主流的經濟史？為釐清此疑問，我們可以參考當時日本史學術界的培育核心、人數最多的東京帝國大學國史系 1943 年的畢業論文題目。<sup>30</sup>

東京帝國大學 1943 年 9 月，15 名專攻國史之史學系畢業生畢業論文題目：

〈近世文化的考察〉有坂隆道／〈國學的發達與其世界性及意義〉石澤徹／〈安土桃山時代的精神考察〉石田修一／〈吉田松陰研究〉岩本深志／〈親鸞思想的特異性及其歷史考察〉馬腹隆章／〈豐太閤的基督教政策及其精神〉押野慶磨／〈近世初期國體觀念之展開〉金井泰樹／〈鎌倉時代的武士與念佛宗〉佐佐木利秋／〈中世初期統一者的問題〉定豐穗／〈新日本建設的除幕與日本主體性的確立—尊王攘夷論的問題〉西田忠夫／〈近世復古精神的展開——近世我國歷史自覺的考察〉本庄宗正／〈《愚管抄》考序說〉眞坂忠之／〈近世初期都市的考察〉松井迪夫／〈藤原時代的貴族精神〉水谷剛雄／〈北畠親房的時代〉宮脇信久

雖然僅能從論文題目觀察，但在著名教授平泉澄授課的背景下，當時畢業論文主題的時代自然會集中在鎌倉到江戶初期，內容則多偏重文化史、精神史及宗教思想，或是明治維新的思想史。同時，鮮少論文關注與「社會」相關的視角，這一現象耐人尋味。赤木並非就讀四年制大學，而是畢業於三年制具師範大學性質的文理科大学，她的畢業論文在當時的學術潮流中或許稍顯超前，但仍可視為時代背景下的產物。此外，畢業論文之所以於 1943 年 9 月提交，是因為該學年的畢業生必須提前畢業，以作為「學徒出陣」的對象被徵召出征。太平洋戰爭晚期，在總體戰背景下所謂「皇國史觀」的潮流，容易和包含宗教史在內的文化史潮流相互結合。誠如昆野伸幸等前人的研究所指出，此一時代潮流對於「國史」學系的學生影響深遠；又如同赤木的回憶錄內所言，「女性史」這一關鍵字亦與之密切相關，這一點尤其值得關注。

大學畢業之後，赤木復職於青山學院女子學校，擔任中等教育的教職員，並持續研究古代文化史。（譯按：赤木於東京女高師畢業後，曾於 1925 年於青山學院女子學校短暫任教，後於 1929 年進入東京文理科大深造。）戰爭末期，她在青山學院女子專門部獲得教授職位。1947 年春天開始，赤木受聘為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兼任職員，她回憶道：「我以第一位在大學學習歷史的女性身分回到母校，並開始擔任兼任講師。」<sup>31</sup>當母校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實現長久以來的目標，得以升格為大學（御茶水女子大學）時，時年 49 歲的赤木則取得助理教授的職位。

赤木作為「第一位在大學學習歷史的女性」，她能夠在大學擔任教職，正是戰後

<sup>30</sup> 此外，1942 年 3 月東京文理科大學的國史學系畢業生則僅有 6 名，其中包含 1 名女性。

<sup>31</sup> 赤木志津子，〈史学研究の志〉，頁 193。



的時代背景所促成。一方面是因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升格為女子大學，另一方面則是從舊帝國大學開始，原先僅限男性的「大學」將入學的性別限制鬆綁。

同時，赤木的案例也顯示，接受文理科大學學術訓練的畢業生，在戰後成為大學歷史教育者亦是人才輩出。許多設有歷史學系的學校都是師資培訓的機構，因此，我們必須瞭解，包含文理科大學在內以師資培育為導向的科系，不僅擴大了戰前歷史學僅限於專業研究的學習範圍，更在戰後持續支持日本歷史學的發展。

接下來，我將進一步探討另一個論點，從總體戰背景下的「女性史」視角來分析山川菊榮的著作。

### 三、該如何解讀《武家的女性》與《我所居住的村莊》？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1940 年代的總體戰要求擔任要職的女性積極投入對戰爭的支援。赤木亦在此背景下被拔擢，於 1940 年在政府學術機構「日本學術會議」上，發表紀念「（神武天皇）紀元 2600 年」的演講。她在回憶錄內對此有所自省，意識到自己作為戰爭下被動員的女性知識份子之一的處境。大江的研究指出，1944 年許多舊制私立女子大學紛紛新設史學系，他形容：「女子高等教育機構內的史學系，是戰時體制下培養愛國精神的一環」。山川菊榮的文章便是在此時代背景下寫成。事實上，當時的歷史敘述對於「女性史」這一嶄新元素的需求正逐漸出現。因此，以下我將以此為前提，進一步探討山川的文本。

#### （一）總體戰下的「女性史」

眾所皆知，著名的女性歷史學家高群逸枝在中日戰爭前後，逐漸以女性史研究者的身分打開知名度。自 1936 年出版的《大日本女性人名辭典》以來，高群便被寄予厚望成為撰寫學術性「女性史」通史的作家。之後她陸續完成《大日本女性史》（1938）、《女性 2600 年史》（1940）、《日本女性傳》（1944）等作品，身處戰前日本的總體戰與戰爭時期仍執筆不輟，十分多產。高群這一系列的研究試圖透過文獻考證，證明古代日本為母系社會，因而被戰後的史學史視為古代女性史的開創性嘗試。

高群在《大日本女性史》的開篇試圖釐清「女性史是什麼」，並揭示其方法論的特徵。她指出，江戶時代的《大日本史》等作品，是以列舉人物的方式，採取通史敘述所撰寫的「女性史」，1910 年代以後亦延續此風格。<sup>32</sup>然而高群認為，這種停留在人物史

<sup>32</sup> 久保田辰彦，《日本女性史》（東京：弘道館，1914）、中川一男，《日本女性史論》（東京：大日本圖書，1925）、龍居松之助，《女性日本史》（東京：章華社，1933）、大井田源太郎，《日本女性發達史》（東京：刀江書院，1941）。大井田源太郎也著有《公家の女性と武家の女性》（東京：金鷄學院，1936）。《日本女性發達史》後被收錄於《複刻日本女性史叢書》第 14 卷（東京：クレス出版，2008）。

的寫作方式已不再符合近代歷史學的發展，今後的研究應更關注「文化史與生活史的記載方法」。她強調：「女性史一方面應研究女性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應納入女性自身立場的見解」。<sup>33</sup>此外，近代史學下文化史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政治事件的過程或偉人傳記，而應針對人類與社會所創造的文化產物進行批判」。<sup>34</sup>高群所構思的女性史，與文化史這類局部歷史高度契合。對她而言，女性史與政治過程之間的關聯並非絕對的課題。

另一方面，與歷史學、特別是歷史教育相關的學會「歷史教育研究會」，於1937年9月將會誌組成專號並重新命名為《女性史研究》，<sup>35</sup>以論文集形式出版。該書共分為3部，除了7篇總論（由中山久四郎等7人撰文，包含「國史」、「中國史」、「西洋史」3篇，及4篇探討日本各時代）之外，亦收錄了14篇不同學說的論文，以及3篇教育主題的論文。序文中指出，在近代歷史學發展的當下，「女性史領域在學術上尚未被開拓」，是為嶄新的課題，同時亦表明該書是「首次以嚴謹的學術立場來解讀女性史」。在各學說的文章中，首先以時代區分，接著進一步依社會階層劃分，除了「近世武家社會的女性」、「近世町人社會的女性」，還包含井上清的「近世農民社會的女性」等嘗試從社會經濟史觀點切入的女性史敘述。當中所描繪的女性形象是能夠維持生計與家業的積極角色。雖然並非每篇文章都有明確的方法論及研究對象，但專號內的作者皆共同意識到，歷史學中的女性史若僅以人物列舉的方式呈現，是不夠全面的。

此外，該專號的一大特色在於對「教育」議題的關注。例如，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中東史教授內藤智秀在專號中投稿，探討「女性與歷史教育」、「高等女子學校內的歷史教學」以及「小學女童的國史教育」，聚焦於女校或國小女性教職員的教育實踐。這或可顯示，《女性史研究》專號所討論的女性史，是被置於當時歷史教育實踐的脈絡下加以理解的。

然而我們必須留意，當時試圖將女性史與歷史教育結合的觀點，背景源自於1937年後中等教育歷史科目的重組。<sup>36</sup>「國民科」被重新劃分為「道德倫理、國語、歷史、地理」，其中歷史被視為「國體相關學科」的核心。尤其在高等女子學校，全新的「國民科」成為基礎教科，根據新課綱，在五年制高等女子學校內，歷史科目總計需達240小時，其中日本史須佔160小時。新課綱預計於隔年1938年開始編纂全新教科書，內藤甚至指出：「特別是在高等女子學校，高年級的國史課本整本都是女性史」。<sup>37</sup>

<sup>33</sup> 高群逸枝，〈女性史の目的〉，《大日本女性史》（東京：厚生閣，1938），頁4。

<sup>34</sup> 高群逸枝，〈女性史の目的〉，頁3。

<sup>35</sup> 歷史教育研究会編，《女性史研究》（東京：四海書房，1937）。

<sup>36</sup> 1937年3月27日，文部省制定了符合國體明徵與教學創新的新版「中等學校歷史科教學課綱（教學要目）」，對高等女子學校以及實科女子學校（譯按：類似技職學校）中的道德倫理、公民、國文漢文、歷史以及地理科課綱進行修正。

<sup>37</sup> 內藤智秀，〈女子と歴史教育〉，歷史教育研究会編，《女性史研究》，頁418。

然而，實際堪用的女性史教材卻寥寥無幾。在高群的倡議之下，學校端開始出現批判的聲浪，指出「女校使用的國史教科書，內容只不過是中學課本的節錄本」。<sup>38</sup>那麼，在戰時背景下，女性史敘述究竟被期待扮演何種角色？《女性史研究》論文集認為，女性史有望補充傳統政治史敘述所未見的嶄新視角。另一方面，女性學習歷史的意義又何在？在這部分，和以往理性（即具有男性特質）的歷史敘述不同，女性的歷史書寫被期待能以更具情感與人性化的方式呈現歷史。前述的內藤便強調，「與女性有關的史實」是一種「情感的淘汰」。

事實上，《女性史研究》所涵蓋的兩種「女性史」方向——研究者與歷史教育之間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總論部分主要採取社會經濟史的方式探討「女性在哪裡？」，相較之下，教育部分的內容則有所差異。不論在方法論或是研究目的上，該書對於「女性史」這一全新研究對象的敘述，似乎都未能形成共識。另一方面，受時局影響，女性作為理性的對立面、情感承載者的論點被加以強調，於1937年出版之際，我們可以看出該書所期待的女性史框架，是能夠強化性別角色，或至少確保其敘述不偏離既定的性別形象。<sup>39</sup>

然而到了太平洋戰爭晚期，社會對女性形象的需求不可避免地發生巨大轉變。戰爭末期，女性大大脫離傳統的性別角色，成為步槍後積極支援戰事的戰力。此時，勞動的婦女才是符合戰時的女性形象。山川菊榮的「生活史」及「女性史」等著作就是在這個時代下寫成的。

## （二）《武家的女性》與《我所居住的村莊》在過去與現在如何被解讀？

1940年代許多從歷史及民俗學角度書寫的女性史與生活史著作陸續問世，這些作品被稱為「婦女取向的書籍」。舉例來說，柳田國男編纂的一系列女性叢書，由三國書房出版，每卷約250頁，當中就收錄多位當今知名的女性民俗學者的作品。<sup>40</sup>例如瀨川清子的《海女記》（1942.11）、增補版（1943.9）、江馬三枝子的《飛驒的女性們》（1942.12），該書於隔年出版第3版，並於同年6月出版《白川村的大家族》。於太平洋戰爭晚期，飛驒山村家戶與家族生活史的意義重新受到社會關注，而這些作品所描繪的女性形象，是為了維持生計而勞動的人們。或許因為民俗學視角的生活史敘

<sup>38</sup> 竹田菊，〈高等女學校に於ける歴史教授〉，歷史教育研究会編，《女性史研究》，頁421。

<sup>39</sup> 內藤智秀，〈女子と歴史教育〉，頁414。

<sup>40</sup> 柳田國男《小ざき者の声》、瀨川清子《海女記》（1942.11；1943.9 增補版）、瀨川清子《販女》（1943.10）、江馬三枝子《飛驒の女たち》（1942.12；1943年3版）、《白川村の大家族》（1943.6）——這些作品以民俗學的視角重新關注飛驒的山村，當地的家戶、家族與生活進而開始受到社會重視。能田多代子《村の女性》（1943.3）、今和次郎《暮らしと住居》（1944.6）、西角井正慶《村の遊び》（1943.5）、篠遠よし枝《くらしといふく》、山川菊榮《武家の女性》（1943.3）、宮本常一《村里を行く》（1943.12）、《家郷の訓》（1943.7）、鷹野つぎ《娘と時代》（1944.1）、大藤ゆき《児やらひ》（1944.5）、森口多里《町の民俗》（1944.6）、小寺融吉《舞踊の歩み》（1943.12）、高藤武馬《万葉女人像》（1944.5）。



事才是嚴格審查時代所允許的表達方式，但同時，書寫者們應該也投入了各種心思與工夫。這般以「人」的生活與生計為主的敘述方式，和大江所指歷史學在當時被視為「戰時體制下培養愛國精神」的趨勢未必直接相關。山川菊榮的《武家的女性》（1943.3）以及《我所居住的村莊》（1943.12），亦是於此系列叢書內出版。

然而在山川菊榮寫作時，她的活動時常受到監視。針對這一點，關口すみ子於近期的一份研究內提出了具體的論證。衆所皆知，山川菊榮的丈夫山川均（1880-1958）於1937年12月，因人民陣線事件（政府依《治安維持法》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鎮壓）遭檢舉入獄。1943年的時間點，他正為了判決進行上訴。而山川菊榮本身也因為《女性五十講》（1933）一書內容聚焦勞動問題，並涉及比較當時世界各國的女性議題，而受到部分刪除、遮蔽，甚至是禁止出版的處分。<sup>④①</sup>山川於1941年1月發表的隨筆集《村裡的秋天與豬隻》（村の秋と豚）引起了柳田國男的關注，進而接受柳田邀稿於叢書系列內出版兩本專書，即《武家的女性》與《我所居住的村莊》。然而因為作者是山川之故而被當局擱置，據說柳田為此多次往返內務省情報局進行溝通。最後兩冊專書得以出版而未遭禁止，推測山川為了通過審查也盡量留心各種細節措辭，謹慎處理文字。

那麼，後世如何評價山川的作品？關於戰爭時期山川的寫作產出是否構成對戰爭的支持，過去曾引發爭論。<sup>④②</sup>即便是將山川作品解讀為「戰爭下的抵抗」的鈴木裕子，也認為這兩本書是「進入了一個以民俗學世界打造的『避難所』」。但在當時，對於山川作品的評價卻略有不同。

首先，一般對《武家的女性》的評價認為，該書「試圖藉由描寫知名或無名女性的傳記，以振興婦女精神」。比起民俗學，當時的評價更關注其內容是否符合時代局勢。<sup>④③</sup>

另一方面，以介紹歷史學術書籍為主的《國史新著改題 昭和19年度》則花了相當篇幅介紹《武家的女性》，由《國史大辭典》編輯部的高木真太郎擔任編輯並撰寫分析解說。他認為此書可以清楚呈現出武家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勾勒出基於當時經濟基礎下簡約樸實的女性生活，並點出婚姻是家庭的核心問題，給予極高的評價。此外，關於幕末水戶藩血洗的動亂，高木指出山川透過近親視角的體驗，如實呈現出水戶藩在黑暗過渡期的社會狀況；文風與內容交織著優美如畫的軼事，讀來令人愉悅。整體而言，高木認為該書可作為幕末社會史的參考資料，其以水戶藩為中心的敘述尤

④① 參見：關口すみ子，〈内閣情報局による「婦人執筆者」の査定と山川菊榮：「最近に於ける婦人執筆者に關する調査」（一九四一年七月）〉，《法學志林》110.2（2012）：1-26；鈴木裕子，〈忘れられた思想家山川菊榮：フェミニズムと戦時下の抵抗〉（東京：梨の木社，2022）。

④② 外崎光広，〈山川菊榮の日中戦争期婦人論〉，《松山大学四〇周年記念論文集》（1990）。

④③ 日本出版協同株式会社編，《日本出版年鑑：昭和19-21年版》（東京：日本出版協同，1947），頁24。



其值得參考。《武家的女性》不僅是一部融合政治史的社會史，內容還記錄了山川母親千世的口述歷史，並輔以文獻史料，因此也被評價為具有考證水準的歷史敘事。

事實上，這兩本書的史料運用方式，已隱然展現了現代歷史學的方法。舉例而言，《武家的女性》是將祖父青山延壽的私人文件與相關公文書信等史料，結合口述歷史後建構而成的歷史敘述，家族歷史部分則貫徹母系的梳理。另一方面，《我所居住的村莊》則幾乎未引用地方志等文獻記載，而是以村民世代相傳的地方傳說與家族記憶為主軸。同時，為呈現人口遷移的數據，該書結合了國家政策中人口問題的相關資料與知識，是最早採取此取徑的著作之一，山川亦在前言中感謝二戰時設立的厚生省研究所成員荻野了協助提供資料。<sup>44</sup>

《武家的女性》因為記載許多關於武家生活的珍貴資訊，戰後旋即成為 1970 年代女性史與教育史的重要回顧文獻，並被引用於西岡虎之助與鹿野政直等人的大眾取向通史著作中。山川的《武家的女性》遂成為幕末維新時期的重要歷史名作。

至於另一本著作《我所居住的村莊》，雖然當時的書評反應情況不詳，但該書曾被 1950 年代地方交通史相關的學術論文所引用，<sup>45</sup>同時也是戰後地方史研究的基礎文獻。<sup>46</sup>山川本人亦曾應邀撰寫一篇與藤澤宿場有關的文章（譯按：宿場即驛站，藤澤宿位於神奈川縣藤澤市，是東海道五十三次的第六個宿場）。<sup>47</sup>此外，《我所居住的村莊》中〈小米飯與大麥飯〉的章節，後來亦成為民俗學探討插秧儀式的重要回顧文獻，並經常與宮本常一及柳田國男的著作並列於相關研究卷末的參考文獻之中。<sup>48</sup>這或許反映出該書對於高度經濟成長前日本生活史的描述，受到了社會的關注。

如前所述，儘管這二本作品被視為優秀的歷史研究書籍，但是戰後的歷史學界卻未將山川菊榮這位傑出思想家的戰時歷史著作納入史學史的範疇內。特別是《武家的女性》，為何未能在幕末維新研究或是戰後女性史內佔有一席之地？簡單的回答可從兩個層面推想：第一，如同芳賀徹所揭示，此應和山川身為勞農派知識份子脫不了關係。<sup>49</sup>戰後女性史研究的領頭羊井上清是講座派歷史學的代表人物，因此當時的研究主流是「婦女運動史」，這趨勢並一直持續至 1970 年代晚期。應該要到 1980 年代晚

<sup>44</sup> 荻野了於 1942 年 2 月在衛生統計學部任官。國立公眾衛生院，《創立 15 周年記念誌》（1954），頁 27。

<sup>45</sup> 埜上衛，〈西三河における交通史の諸問題〉，明治用水普通水利組合，《明治用水研究報告 1》（1951）。

<sup>46</sup> 藤澤市教育委員會，《藤沢通史 總説編》（1961）、《神奈川県史》（橫濱：神奈川県立図書館，1961）。

<sup>47</sup> 山川菊榮，〈宿場、藤沢をめぐって〉，收入林房雄、土橋治重編，《湘南・箱根（日本の風土記）》（東京：宝文館，1960）。

<sup>48</sup> 伊藤幹治，《稲作儀礼の類型的研究——日・琉基層文化の構造》（東京：國學院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1963）。

<sup>49</sup> 伊藤セツ在《山川菊榮研究——過去を読み、未來を拓く》一書中指出，1928 年之後山川菊榮等人逐漸淡出直接參與社會運動。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及思想，於 1920 年代與共產國際之間的分歧和立場差異更加顯著，在關於資本主義的爭論上，山川菊榮與丈夫山川均皆屬於與「講座派」對立的「勞農派」。1928 年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遭到大規模鎮壓，迫使相關活動只能轉向地下。

期左右，歷史學中女性史的研究對象才逐漸聚焦生活史。另一方面，關於山川菊榮的相關研究雖然為數頗豐，卻較少涉及她在戰時的寫作活動。<sup>50</sup>戰時女性知識分子對於戰爭的支援態度此一議題，也影響了1980年代編纂的《山川菊榮集》，當中對於她在戰時發表的相關言論收錄有限。

在研究幕末維新時期的日本史學者中，對山川的《武家的女性》產生濃厚興趣的研究者之一，是近代思想史學者 Kate Wildman Nakai (1942-)。Nakai 對於該書的21世紀英譯版 *Women of the Mito Domain: Recollections of Samurai Family Life* 評價極高，她認為該書鉅細靡遺地描繪了下級武士階層的細微日常生活。同時，她也留意到1940年代的歷史如何被融入於文本之中。Nakai 將幕末水戶藩的政治狀況與社會主義思想家山川菊榮的社會運動視野相結合，並將山川的文字解釋為對太平洋戰爭時代局勢的「隱性批判 (an implicit critique)」。

從一方面來看，派系鬥爭從內部摧毀了水戶藩，這一點與社會主義運動在奮力抵抗政府鎮壓的同時，卻因內部分裂而遭致弱化的情形相互呼應。另一方面，當代軍政府的意識形態與水戶藩尊王攘夷的主張有諸多相似之處，1940年代時將之譽為愛國主義的典範。兩相對照之下，《武家的女性》不僅描寫了山川祖先所經歷的德川幕府末期武士生活，同時也融入她對自身所處時代的**隱性批判**。同樣地，她提到水戶藩居民認為德川齊昭強硬推動的緊縮政策使社會籠罩在陰影之中，這也反映出她對於1940年代承繼齊昭思想的當權者所推行類似政策的看法。<sup>51</sup>

針對戰爭時期寫作的種種制約，Nakai 指出：

她明智地提及當時的情況，大概是為了避免作品無法通過出版審查，或即便出版後仍面臨禁止銷售的風險。<sup>52</sup>

其中的代表案例就是〈結婚與離婚〉一章。在此章節，山川多次引用明治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新女大學》，Nakai 認為這反映出山川對於江戶時代婚姻制度的否定，並顯示她對明治以後婚姻制度的讚揚。

<sup>50</sup> 芳賀徹在1983年岩波文庫版《武家的女性》的解說中指出，當時日本學術界的動向逐漸採納年鑑學派的社會史學說，包含山川戰後的另一部著作《覺書 幕末的水戶藩》(1974)，兩者皆為日本社會史的先驅作品，該書作為幕末社會史的考證文獻同樣評價甚高。此外，《覺書 幕末的水戶藩》出版文庫版時，負責撰寫解說的奈良辰也曾提到，雖然他知道山川菊榮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沒料想到她還撰寫維新史。他讚揚山川基於祖父及親屬留下的信件與公文所構築的歷史敘述：「這確實是一部偉大的史書。在戰後的日本史學會中堪稱出類拔萃。」奈良辰也，〈解說〉，山川菊榮，《覺書 幕末の水戸藩》(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450。

<sup>51</sup> Kate Wildman Nakai, "Introduction," in *Women of the Mito Domain: Recollections of Samurai Family Life*, by Kikue Yamakawa, trans. Kate Wildman Nakai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xii.

<sup>52</sup> Kate Wildman Nakai, "Introduction," in *Women of the Mito Domain*, p. xxi.

那麼，山川過去是如何解讀福澤諭吉的女性論？以下為她於 1922 年以英文出版的評論，從中可見她對福澤著作的批判：<sup>53</sup>

《新女大學》在受教階級間享有盛譽，對於一般大眾也具有不小的影響力。這意味著資產階級理想對封建道德的勝利。毫無疑問福澤先生是位公正、高尚且領先時代的紳士，但他無法跳脫自身的資產階級身分來衡量世界。他唯一談論的女性生活是資產階級家庭內的妻子或母親角色，他從未觸及勞動階層婦女的問題，並理所當然地認為家庭是女性唯一自然的活動場域。不過，他認為有必要給予女性多一點自由和獨立，以使她們成為更聰明和有能力的伴侶。簡單來說，他的思想是某種扭曲的資產階級女性解放概念。

雖然山川對於福澤《新女大學》的評價略顯老套，但她點出福澤忽視女性勞動的歷史，批判他未考慮到女性能夠工作自立。那麼，在《武家的女性》中多次引用福澤，此一態度的轉變，是否意味著她在法西斯主義影響下意識形態的「轉向」呢？1940 年代女性知識份子被允許的寫作活動，時常招致支持戰爭的指控而遭受批評。以下我將重新探討山川兩部作品的獨特性，以及該如何在當時的脈絡下解讀前述她對福澤諭吉的態度。在介紹內容之後，我將進一步分析這二本書在歷史敘述手法上的特點。

### （三）解讀《武家的女性》和《我所居住的村莊》

#### 1. 《武家的女性》

該書以水戶藩的中下級武士及其家族生活史為核心，構成一部幕末維新時期的社會史與生活史。全書共分為十三章，分別為：〈學校的朝與夕〉、〈主婦的每一天〉、〈作為一位習字生〉、〈作為一位裁縫工〉、〈和服〉、〈嗜好〉、〈食物〉、〈住居〉、〈親族的伯母們〉、〈結婚與離婚〉、〈子年騷亂〉、〈受難時代〉、〈維新與女性〉。

本書的歷史敘事聚焦於水戶藩中下級藩士及其家族的生活史。在〈子年騷亂〉之後的章節，描繪了「平凡家庭的女性」因藩內政爭、恐怖行動、懲戒與肅清等政治動盪所遭受的困境，這些描述也常被解讀為和該書戰時出版背景的歷史性相互呼應。書中最後三章，將幕末時期鮮活的在地政治史與中下級武士的生活史相結合，構成了一段社會史敘述。

<sup>53</sup> Kikue Yamakawa, "Women in Modern Japan—VI. The Women's Movement," 《社會主義研究》1.2 (1922.1): 1-2。此雜誌（英文名 *The Shakai-Shugi Kenkyu: A Monthly Study 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Labor Movement*）為山川均、山川菊榮主筆的日文明刊誌。山川菊榮曾於其上以英文連載 "Women in Modern Japan" 一文。這些山川以英文寫成的女性論文章，並未收錄於全 11 卷的《山川菊榮集》當中（東京：岩波書店，1981-1982）。



山川筆下的生活史敘述揭示了每位「出生於武士之家的人」所面臨的種種境遇，以及江戶末期武士階層所處的經濟結構。從該書建構在經濟史基礎上的社會史與生活史觀點來看，其歷史敘事的方法與當時對女性史的期待之間存在一定距離。另一方面，就與當時局勢的關聯而言，書中對於「武士」主題的描寫，與強調精神主義的武士形象相去甚遠，反而更接近於對武士形象的破壞。

根據該書，水戶藩的 1000 名藩士中，有 700 人的俸祿低於百石，單憑身分所賜的俸祿不足以維持生計。因此他們被允許從事副業，婦女與老人們也必須每天工作。在江戶時代末期，藩士及其家族的日常生活極為拮据，他們甚至不知道「坐墊」為何物，即使有客人來訪也不會使用。雖然平時會購買紅糖、醬油，但味噌則是自己製作，在飲食開銷上十分節省。衣著部分，從事兼職工作的女性沒有人每日化妝施粉。此外，該書也鉅細靡遺地記載了當時武士家族具體的生活細節，包含武家男女束髮的差異、已婚女性「染黑齒」（お歯黒）的習俗、不同身分與職位間束髮形式的區別、以及老者們口述談論的變化等。同時，山川在生活史的敘述中，呈現出人們在面對「世事變遷」時所展現的性別差異。即便在尚未出現社會性別概念的時代，山川對於書寫對象的觀察，已經時常意識到文化中不對稱的性別差異了。

山川筆下的社會史及生活史特徵，是具體呈現出各個案例背後的社會結構及其關係，同時捕捉細微的變化，進而探討時代脈動的意義。針對武士的生活，山川認為，江戶末期的武士家族已經脫離生產及軍事單位，轉化為依賴主君收入維生的生活消費單位。武士已經是消費者的觀點，與勞農派所設想的維新形象直接相關。但與此同時，該書對武家女性的變化及其分析，從結論來看，雖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歷史階段為前提，卻也點出其中的性別歧視。從這一點來看，或許可以說她所呈現的歷史觀，已經先於性別理論的發展。

首先，在水戶藩徹底落實領地內自給自足的歷史階段，女性是親手製作和服，並將之視為自身的財產。然而，在 1858 年日本開國以後，女性與「衣物」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深受外國棉布的觸感所吸引，女性遂不再親自縫製，而是進入了一個以金錢購買衣物的時代。

關口すみ子留意到，<sup>54</sup> 山川對於歷史敘述的關注可從 1940 年《新女苑年鑑》刊載的〈現代百婦人錄〉中略知一二，山川於「今後的方針」一段上寫道：

我從很早以前就對近代、特別是幕末至明治時期的日本經濟史產生興趣，於是開始逐步閱讀相關文獻。可能的話也想嘗試自己著手進行研究。現今我仍懷抱著宛如大一新生般的心情，對於將來的這些工作充滿期待。——《新女苑年鑑》（1940 年 1 月）

<sup>54</sup> 關口すみ子，〈「主婦の歴史」と「特攻精神をはぐくむ者」——月刊誌『新女苑』における山川菊榮と柳田国男〉，《法学志林》110.2（2012）：27-74。



儘管這是在 1940 年初做的決定，但「幕末至明治時期的日本經濟史」確實也是勞農派關注的研究課題。然而，山川在當中加入性別差異的結構，或結合如「棉與消費慾望」的視角，展現出深具說服力的實證分析手法。舉例來說，「和服是歸誰所有？」這個議題，山川著眼於自立與自給自足的觀點，探討女性和服作為購買商品的意義，並與女性親手製作的和服進行比較。她認為，後者是丈夫無法從妻子身上奪走的，因為其不屬於丈夫，而是由妻子親自產製，這個事實並由家族或社會所共同認知。

另一方面，本書所描繪的江戶時代婚姻制度，透過〈親族的伯母們〉一章中錯綜複雜的親屬關係故事，處處指出婚姻對女性的不利。什麼樣的社會結構會將婚姻關係視為女性的必要選擇？女性又該如何從中獲得解放與獨立？倍倍爾（August Bebel）的《婦女論》即在探討這些問題，而該書在日本的首次完整日譯（1923 年）正是出自山川菊榮之手。20 年後，山川在言論受到極端管制與嚴密監控的狀態下，她藉由 19 世紀日本的地方案例，透過「婚姻」議題反映出社會的真實樣貌。她指出，身分階級制度的限制反而使性別差異變得更加相對化。町人的女兒無法成為武家正妻、在武士階級男性中，除了繼承家業的長男外，次子和三男的生活常陷於困境，因而出現大量以養子形式締結的婚姻關係。由於婚姻可以保障家庭的再生產力與男女勞動力的來源，因此男女離婚和再婚的案例眾多；此外，男女普遍早逝亦是再婚頻繁的主要原因之一。<sup>55</sup> 本書所建構的婚姻理論恰與 17 至 18 世紀歐洲人口史與社會史視野下的農民世界相互呼應。

無論如何，在江戶時代下級武士的婚姻中，家庭的約束力強大，作為男性的權力也被相對化。如明治民法制度允許的那般，單憑身為男性便可以恣意妄為，在江戶的武家是不被容許的。這般江戶時代的現實，不正恰好洞穿了明治以後近代法律與婚姻制度所保障的「丈夫強權」嗎？舉例來說，山川在引用福澤諭吉《新女大學》的段落後接著指出，虐待或放逐妻子等行為在身分制度下是不被允許的，涉事男性會因「親戚干涉」或「基於常理的調解」而受到廢嫡或被迫隱居的制裁。當然從一般的閱讀理解來看，後續文意相較於江戶時代，似是更傾向肯定 1940 年代的制度。然而，將近世社會的特徵與 1940 年代進行對比的敘述手法，是否會使讀者有解讀空間，理解為作者對明治民法認可男性戶長單方面行使家族權力的批判？明治民法不承認妻子的財產權，離婚時若丈夫濫用法律條文，甚至可以拒絕歸還妻子的和服。這是因為明治民法「發明」了將男性戶長作為妻子財產管理主體的緣故。

然而本書生活史的真正價值，在於透過慎選案例與融入個人記憶的敘述方式，將幕末水戶藩深陷恐怖行動與內部肅清的「政治」與日常生活的細微變化相互連結，呈現出當時的歷史面貌。例如讀者可以在〈子年騷亂〉中切身感受到動亂的影響，母親

<sup>55</sup> 山川菊榮，《武家の女性》（東京：岩波書店，1983），頁 133。

千世兒時記憶中武家宅邸寬廣而荒廢的景象栩栩如生。山川首先寫道：「宅邸的土地是藩賜與的」，接著談到每個家庭因身分階級不同，土地面積也有所差異，並描述水戶藩武士整體的貧困，和他們的廣闊宅邸不相稱：「雖然依照身分差別土地大小有所不同……但每一家都過於寬敞，十分老舊且年久失修……空曠的武家宅邸」。<sup>56</sup>但為何人會消失？因為「幕末的水戶不斷發生血腥暴亂，每次都有大量傷亡」。<sup>57</sup>捲入內亂的家族成員則因「抄家滅族」或「沒收宅邸」而四散流離，山川補充道：「還有其他好幾間宅邸都是如此」。這般無人居住、一排排偌大荒蕪矗立的武家宅邸，才是真正象徵幕府末年水戶的心象風景——一個明治維新政府引以為傲的輝煌時代。<sup>58</sup>從上可見，山川的歷史敘述是以經濟結構為基礎的生活史敘事，但是如同她在戰後立即重新建構民間傳說、動筆書寫「生瀨事件」那般（江戶初期，水戶藩處刑屠殺小生瀨村全村，並將該事件從藩史中刪除）（譯按：山川菊榮於1946年1月在雜誌《新歷史》上主筆撰寫生瀨事件），她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去看待過去的事件？可以說山川的歷史敘事呈現出作者本身的歷史觀點，她不是在藩的「正史」或是「國史」中增添內容，而是企圖從根本改寫歷史。

山川筆下的明治維新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捩點，最後她也呈現出此歷史分水嶺與人們日常生活之間的落差，例如「水戶一點都沒有改變」、「母親千世直到廢藩置縣後離開江戶時，才察覺到社會的變化」等描寫。她進一步提及，家族是由女性血統取代過去因政爭消亡的男性，重建再興家業。在撰寫這兩部作品之前，山川曾出版《村裡的秋天與豬隻》，雖然該書寫的是關於父親的回憶，但包含戰後所寫的《女二代記》在內，她勇於以女性家系故事的角度描繪自身的家族史。然而，若將山川的歷史敘事視為對明治以後男系天皇制度的反抗，則或許有些過度解讀。

山川在歷史敘述上的實驗性寫作，在《我所居住的村莊》中更突顯了重構口述歷史的魅力。該書透過當地居民、村內勞動者與作為歷史書寫者的山川之間的對話，展現了多元在地歷史的再發現過程及其成果。

## 2. 《我所居住的村莊》

文本的舞臺發生在山川從自幼成長的東京所移住的村莊，她將定居期間的種種觀察整理成專書。1936年「五一五事件」之後，山川舉家搬到神奈川縣舊街道（譯按：驛道）沿線附近的農村，開始經營鵪鶉蛋生產的事業。如她所說：「這是我第一次在農村生活」、「我完全處在世代務農的本地農家之中」，自己也成為農村生產者的一員了。永井道雄認為，該書以「戰爭時的農民生活」為主題，「忠實呈現出隨著產業結

<sup>56</sup> 山川菊榮，《武家の女性》，頁80。

<sup>57</sup> 山川菊榮，《武家の女性》，頁81。

<sup>58</sup> 山川也細心留意到有其他和藩內政治構想無關的平民，因為「被天狗黨強制徵收」而遭捲入動亂。《武家の女性》，頁153。

構的歷史變遷，人們的日常生活與認知逐漸產生變化，這些改變雖然緩慢但確實持續進行」。<sup>59</sup>作為戰時作品，《我所居住的村莊》嘗試透過參與式觀察探究農村生活的結構與變遷，並藉由記錄村民們對生活空間中生業活動的講述，試圖在當代史中重新建構一種全新的歷史敘述。

全書分為以下 14 章，但是每章的篇幅長度不一。負責撰寫文庫本解說的鹿野政直將全書的結構分為三部分：

- (1) 〈雲助的東海道〉、〈助鄉之禍〉、〈黑船將至〉
- (2) 〈相模野的過去〉、〈建村元老〉、〈武士與百姓〉、〈守護神與信徒〉、〈活動與五人組〉
- (3) 〈小米飯與大麥飯〉、〈棉花田與狐狸的去向〉、〈三代之女〉、〈農業由誰來傳承〉、〈耕地復甦〉、〈戰時下的農村〉

第一部分講述幕末維新時期的村落，描寫山川居住的村莊以及人們活動的場域，並將之嵌入歷史背景內。鄰近驛站的村落往往被捲入時代的動盪之中，本書經常被戰後交通史及街道史引用，其透過編織人們跨越世代的記憶，勾勒出江戶時期驛道史下農民的艱辛。幕末維新時期的政治鬥爭使得人員流動與情報交流急遽增加，也改變了驛道沿線人們的生活。

對於以驛站為中心、散布在驛道沿線的村落而言，驛道彷彿活生生般，村莊與驛道悲戚與共，一同經歷興盛與衰落。

「我母親說，那段時間父親好像每天都被叫去驛站擔任助鄉（譯按：江戶時代驛站為補充人手不足，而向鄰近村莊徵召的派遣夫役）。好不容易回家，飯都來不及吃、衣服也還沒換，藤澤官府又派人上門，他便召集附近的年輕人們，匆匆忙忙出門去了。我們家小孩很多，在田裡最忙的時候簡直招架不住，母親是這樣講的。」這是村裡一位奶奶的回憶，長者們經常會講述他們父母輩年代生活的艱苦。<sup>60</sup>

驛站附近的村莊是這樣看待黑船的到來：

這使德川幕府大為驚懼，黑船的到來撼動了他們三百年來的基礎，從此之後全日本都持續感受到此影響。東海道的交通流動日漸頻繁，到處都是幕府官員或是飛腳、浪人或賭徒、小偷強盜之徒，驛道沿線往來的人們大幅增加，驛站變得非常繁忙，官員們因而十分易怒，天天召人去做助鄉，田裡的農事都不能好好做。<sup>61</sup>

<sup>59</sup> 永井道雄，〈月報 武家の女性とわが住む村〉，《山川菊榮集》第 10 卷（1981），頁 2-3。

<sup>60</sup> 山川菊榮，《わが住む村》（東京：岩波書店，1983），頁 19, 32。

<sup>61</sup> 山川菊榮，《わが住む村》，頁 39。

另一方面，在別的地方、離驛站有段距離的「我所居住的村莊」則彷彿「棲居於深海的魚」一般，「過著每日種稻產米、繳納年貢的日子」，形成了極具說服力的強烈對比。

除了作者生活於當地的自身觀察之外，本書還收錄村內的古老回憶，無論是 83 歲自耕農婦、或是 81 歲的男性車伕，他們對幕末維新時期的記憶都被重新整理並記錄其中。第一部分描繪了驛道沿線的各式登場人物，以及他們對幕末維新的切身經歷。這是一部「幕末維新史」，描述的是被武士統治階層強加無理要求的百姓，當中也包含在政治情報頻繁流通的時代下遽增的助鄉角色。對於《武家的女性》的讀者而言，儘管書中描寫的是下層社會，但在閱讀時或許將重新意識到百姓與武士階級之間的對比。

第二部分的五個篇章則是以長時間跨度來敘述近世以前的農村。在這些章節中，神話人物登場，並以「比當今探索北滿州或蒙古內地還需要更多勇氣與體力」來比喻他們前往「未開闢」的土地，<sup>62</sup>此舉或許意在迴避戰時的言論審查。然而，村莊的形成與建立最重要的因素在於兵農分離，若要探究「武士為何物？」在本書中便可見到脫離生產角色的武士形象，與《武家的女性》中的論述相互呼應。

武士之所以能夠掌控政權，不單只是憑藉武力優勢，還因為他們身為在地農民，支配土地與生長於農地上的一切財富。也就是說，他們的權力是建立在深植於土地的強大經濟實力之上。現在他們成為純粹的城市消費者，與生產脫鉤且也不再關心農務，但他們的生活品質卻提高了，進而強制取用耗費農村的資源。在農村逐漸衰弱的同時，隨著商業發達，加上遭統治階層吸血般的剝削榨取，因而愈趨貧弱；因此當黑船衝擊來臨時，武士政權便如同被白蟻蛀蝕的樑柱般急速頹傾，這一結果也就不足為奇了。<sup>63</sup>

與前作不同，本書從農村人們的生活出發，觀察並描繪地方社會的生活與歷史，並將武士視為脫離「生產」的群體，刻劃出明治維新時期特權階級解體後的社會變遷。武士作為消費者，其生活的矛盾則由繳納年貢的農民所支撐。儘管我們不難在此看出勞農派的維新觀點，但是山川透過農村人們的真實聲音，描繪出一幅複雜且豐富的幕末維新歷史圖景。同時，本書在描述幕末維新的農村生活時，穿插了許多凸顯戰爭時代的插曲——例如她以大量篇幅描寫年節慶典或活動（年中行事）。在充滿民俗學色彩的第二部分，山川記錄了放風箏的習俗，並描寫一位「在軍艦上服役、家有年幼稚子的年輕父親」。傳統上祈求幼子平安成長的放大風箏活動被迫中止，因為它被視為隨時可能到來的「戰後」娛樂。書中寫道：「戰機的身影與轟鳴聲取代了大風箏

<sup>62</sup> 山川菊榮，《わが住む村》，頁 45。

<sup>63</sup> 山川菊榮，《わが住む村》，頁 56-57。



和它在空中的風鳴，使天空變得十分喧囂」。戰爭期間使得民間活動變質，這一現象也被山川真實地記錄下來。<sup>64</sup>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也就是篇幅佔全書一半的第三部分六個章節，靈活地組合跨越世代的口述歷史並加上厚生省的統計數據，聚焦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郊區農村的人口移動與相關問題。隨著戰局惡化，大量人力被動員投入戰爭，使得農村人口加速減少。第三部分可說是十分立體的歷史社會學敘述，透過參照過去的歷史脈絡，試圖釐清許多當代問題。

舉例來說，村內長者們常說「這裡自古以來便是宜居閑適的村莊」。<sup>65</sup>但事實上，村莊地理位置山多田少，因此以米為主食者僅限於大地主，小農或佃農則以小米、大麥及根莖類為主糧。要到大正時期以後，隨著生活品質急速提升，平民才能夠買到白米；然而當現金收入不足時，他們也只能將白米出售，並混合其他雜糧穀物為食。這些加入的雜穀品質低落，依據當時其他地方的所見所聞，過去糧食貧瘠是普遍的情況。以下引用山川的〈小米飯與大麥飯〉一章：

（即使是被納入東京市區範圍的富裕農家）以白米為主食的情形，要到 1919、20 年戰後景氣時代才較為普遍，在那之前，據說農民並不以米為食。從那之後，農家開闢了種稻以外的收入來源，因此農村內部的消費也隨之增加。此外，朝鮮、臺灣的稻米生產量急遽增加進而輸入日本本土，也助長了此勢。……然而即使農民開始吃米，農家仍是將優良米售出，自己吃剩下來的次級米。……幾年前，婦女團體開始發起胚芽米推廣運動，號召全體國民食用胚芽米，這讓農家的老伯們瞠目結舌。……「不種稻的人說得輕鬆，他們以為農民和他們一樣，都是吃一等米……」。<sup>66</sup>

殖民地統治改變了白米的生產與流通結構，進而影響了其生產與消費模式。農家也開始過著可以食用白米的生活了。然而對於佃農而言，白米仍然是獲取現金收入的捷徑。本書從農家的視角來看待當時代的急遽變化，貼切地描繪出農家生存策略的歷史。戰時農家生活的一大阻礙，便是政府的糧食管理政策，在這些章節內多處描寫政府強制徵購稻米的「供出米」政策如何使農民陷入困境。特別是前述的「胚芽米推廣」，應該是日本婦人聯盟發起的「白米食廢止運動」，該聯盟由擔任會長的 Gauntlett 恒子與市川房枝等人號召眾多團體組成。受到 1930 年代的女性參政權運動潮流所影響，其政策也與之相近。<sup>67</sup>「他們以為農民和他們一樣，都是吃一等米」這句老人的

<sup>64</sup> 山川菊榮，《わが住む村》，頁 75-76。

<sup>65</sup> 山川菊榮，《わが住む村》，頁 91。

<sup>66</sup> 山川菊榮，《わが住む村》，頁 93-94。

<sup>67</sup> 尾崎智子，〈日中戦時下の女性運動：日本婦人団体連盟による「白米食廃止運動」〉，《社会科学》45.3（2015）：105-131。

發言，一方面是極為尖銳的政治批判，同時也鮮明地表達出從農村生活視角所感受到的深刻認知落差。

山川在本書中的歷史敘述焦點，如同前述例子，時常透過歷史脈絡交織著人們的發言與話語，這些言論不一定帶有批判性，引導讀者深入述說者們的生活，進而意識到「當代」的問題。

戰爭時期家族成員奔赴戰場，導致農村勞動力流失。艱苦的勞動使得農民們在五六十歲時「不論男女身上都有某些病痛」，但由於兒孫都去打仗，老人們仍須在水田的泥淖中持續奮鬥。山川寫道：「許多家庭都得將大半辛苦生產的稻米上繳，自己則吃配給米」。<sup>68</sup> 幕末助鄉的困苦與戰時的徵購，對於農村及農民生活而言應當是成對的兩大難題。山川在書中提及「因為最近大豆不再從滿州進來，所以又開始種植了」，<sup>69</sup> 她藉由這類不起眼的細節，使讀者憶起日本帝國時期與戰時的影響。戰時的生活節奏加快，她形容：「比起讓在都會的兒孫享用自己辛苦揮汗種出的美味，首要之務是先拯救全體國民免於飢荒，農民身上肩負這樣的重任」，以及「為了提供軍馬糧草，連乾草都不得不上繳」。<sup>70</sup> 對於讀過《武家的女性》的讀者而言，也可以察覺到本書將白糖、味噌等日用品在地方、階級與時代之間交叉比對的比較歷史手法。戰爭下的急遽變化與農村生活的描寫交相呼應。

第三部分的各章節正如上述所示，充滿了村民們的話語，其中記錄的對話與口述內容份量之大，遠遠超過解說的文字。透過這些描述，讀者可以清楚看見戰爭期間村莊所經歷的急遽變化。

## 結語

以上，本文從「有哪些戰前日本的女性史家？」視角出發，探討了以下三項議題：

- （一）高等教育制度與女性
- （二）國史學是一門「被男性化」的學問嗎？
- （三）該如何解讀《武家的女性》及《我所居住的村莊》？

（一）在第一部分，我首先介紹山川菊榮的生平，並透過翻譯文化探討她在 1920 年代對女性教育與職業的獨到見解。同時，我從女性視角切入，檢視整體教育制度的架構，進而揭示女性被排除在此框架外的現象。

<sup>68</sup> 山川菊榮，《わが住む村》，頁 100。

<sup>69</sup> 山川菊榮，《わが住む村》，頁 103。

<sup>70</sup> 山川菊榮，《わが住む村》，頁 105-106。

(二) 於第二部分，針對「國史學是一門被『男性化』的專業」此一觀點，本文除了相對化「國史學」在高等教育中的定位外，並進一步探討對女性而言，系統性地接受歷史學訓練究竟意味著什麼。在戰前，培育國史學專業人才的大學機構為數不多，因此勢必得關注包含私立學校在內的師資培育機構，例如高等師範學校以及師範學系。從中我留意到赤木志津子這號人物——一位戰前畢業於東京文理科大學、戰後進入大學擔任研究教職的「文學士」。赤木是以正規生身分進入大學接受歷史學訓練，並最終成為研究學者的女性。

(三) 第三部分，我重新聚焦於山川文本背後的總體戰背景，並探討她的兩部著作。

在總體戰時期，除了女性身分外，符合性別角色的「女性史」也因切合時代需求，而被視為全新的歷史教育備受關注。然而，至戰爭末期，性別角色大幅脫離既有框架，女性被要求積極投入前線後方的戰事支援。在生活史與日常史的書寫中，婦女被描繪為從事勞動、經營生計的角色。或許正因為「勞動的女性」符合戰爭時期需要的女性形象，許多女性作家的著作才得以順利出版。

基於上述背景資訊的輔助，本文重新深入檢視山川的兩部著作。這兩部作品無論在歷史敘述方式或是史料運用上，都與 21 世紀歷史書寫所推崇的大眾史學（Public History）相近。山川透過社會經濟史的觀點，藉由各式各樣引人入勝的史實，採取有意識的記述方式來呈現歷史的結構與變遷，使她得以從言論審查的時代中順利脫身。然而，在行文之中仍處處散見她對所處時局的批判，且這種批判的立場可能貫穿全書。在《武家的女性》中，她試圖對抗當代的歷史圖像，而在《我所居住的村莊》中，則是穿越時間軸描繪出時局的變遷。無論如何，兩部作品的核心問題皆指向「究竟該透過誰的視角來觀看歷史？」她嘗試納入多樣性的觀點並進行相對化分析，在強調以國家為歷史主體的時代，山川意圖重構歷史圖景的嘗試格外引人注目。

史學史長期以來都將女性學者侷限於女性史的書寫角色——這樣的觀點或許過於武斷，那麼，值得進一步思考的關鍵問題應該是：史學史為何認定特定女性為歷史學家？對此，我們或許應該回到這些女性學者的著作，重新審視其背後的歷史脈絡，並從後設史觀（Metahistory）的角度加以分析解讀，方能釐清這個問題。